

陈铭枢为美国与中共对话奔走

牛大勇

陈铭枢是北伐名将，在国民政府时期权重一时。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和反蒋斗争中，曾起过重要作用。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，他曾担当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同中共领袖毛泽东、周恩来之间秘密谈判的信使——这段史实是鲜为人知的。

1949年5月底，陈铭枢住在刚获解放的上海，准备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，忽然接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邀他赴宁一叙的请求。原来，司徒雷登正在寻找机会同中共领导人对话，并已同前燕京大学学生、当时南京军管会外事负责人黄华取得联系。司徒雷登听说陈铭枢将赴北平，便想托他给中共领导人传递信息。

陈铭枢与司徒雷登相识多年，颇为熟稔。他与中国共产党也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，此时自然乐于为中共与美国增进相互了解和接触而奔走。于是，他和夫人6月10日来到南京，同司徒雷登晤谈了将近4个小时。司徒雷登请他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方的5点意见和4个文件。5点意见大体为：一，美国人相信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存；二，美国对即将由中共控制的政府，有两点特别关切：（一）是真正尊重人权，还是搞成极权或警察国家？（二）是否从事暴力式的世界革命？三，凡是希望美国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人，都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感到不安；四，在经济关系方面，中共官员言论似乎不鼓励和美国通商；五，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，但中共应该重视司徒大使及其他国家使团首长留在南京的事实。4个文件在于说明和美国保持关系对中国是何等有利与重要。

陈铭枢旋赴北平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这些意见和文件。6月23日，他通过助手罗海沙转告司徒雷登，说他已跟毛泽东、周恩来顺利接触，谈话令人完全满意。而这时，司徒雷登已向黄华提出了亲赴北平的意向，毛泽东、周恩来也准备欢迎他来。美国与中共的关系似乎露出了一线转机。然而在7月1日，美国最高层否决了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请求，他只好在南京坐待陈铭枢的信息。

7月9日，陈铭枢终于给司徒雷登带回了中共领导人的答复。他们在当天下午倾谈了4个多小时。第二天，陈又交给司徒雷登一份长篇备忘录和两个附件。

备忘录是陈铭枢根据到北平后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，以及对毛泽东政治经济思想所作观察综合整理而成。他解释说，虽然毛泽东在6月30日发表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一文中，提到中国将向苏联“一边倒”，但这并非“靠别人”之意，而是中共为实现自己的目标独立采取的一种“政治路线”。美国政府应注意中共对“国家立场”和“政治路线”是有所区别的。国家与国家之间可以有共同的立场而互相合作，但彼此的“政治路线”应允许有所不同，陈铭枢进而引述毛泽东的话说：“在政治上，必须严格；在经济上，可以互相迁就”。

那两个附件，一个是中共领导人联合对司徒雷登的答复。他们希望美国此后停止援助国民党政府重新按照罗斯福、史迪威、华莱士的方式制订对华政策。若能如此，中共自然

以同样友好的态度予以回报。毛泽东特别请司徒雷登阅读他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上的讲话，其中申明：任何外国政府，只要它愿意断绝同中国反动派的关系，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，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友好态度，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、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基础上，谈判建立外交关系。

第二个附件是周恩来对司徒雷登那4个文件的答复。周指出，苏联是第一个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，苏联承认中国革命，苏联在抗日战争中曾给予中国物质援助等等，相比之下，美国过去援助只是“小节”，美国在30年代出售物资给日本，抗战结束后又援助蒋政权。周以此驳斥了司徒雷登对中苏、中美关系的比较。周还举出1937年和1947年的中美贸易数字，证明美国而非中国是中美贸易的受惠者，批驳了司徒雷登关于美中贸易对中国更有利的说法。

总之，中共的既定原则是美国必须先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，停止援蒋，不干涉中共实行与苏联的友好“政治路线”，才能同美国进一步谈判。而美国当时并未决心停止援助国民党政权，也未放弃反共立场，却要求中共首先停止反帝反美的宣传与活动，疏远同苏联的友好关系，甚至背弃共产主义原则。双方的立场如此格格不入，陈铭枢的斡旋因此劳而无功。

1949年，美国与中共虽有对话的机会，却无和解之可能。

(转自1989年7月11日《团结报》编者略作删节)